

略论中国民族精神

刘 纲 纪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既要广泛地借鉴吸取世界各国文化中一切合理有益的东西,同时又不可忘记发扬我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她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所积累起来的文化成果,包含着许多从现代观点看来仍然有巨大价值和生命力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我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轻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这种错误倾向,目前还时有所见。在一部分青年中,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可能缺乏应有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自己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研究得不够,甚或投以不屑一顾的目光,而西方自二十世纪以来却一天比一天更加重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感到好象发现了一个充满着各种深刻启示的新世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著作越来越多。不但研究哲学、人文科学的学者,而且某些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也注意到了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认为其中有着很值得注意的,对于解决现代西方精神文化危机有重要价值的东西。如最近根据F·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编译出版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就是一个例子。该书把中国文化思想归结为“东方神秘主义”是错误的,但它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现代科学发展的条件下也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站在现代科学思想的高度来批判地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它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我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将越来越多借鉴吸取西方文化中一切合理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打破过去那种闭关自守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也必将在现代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得到新的认识和改造,重新放射出它的光芒。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世界范围来看,将是一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在发扬中国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成果而产生出来的文明。它既不简单等同于古代中国的传统文明,也决不会是所谓“全盘西化”的文明^①,而将是东西方优秀文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综合发展,同时又保持着我们民族的特色,对日趋多样化与国际化的世界文明作出我们的贡献。

为了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文明,必然要涉及到中国的民族精神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多方面的、长期研究的巨大课题。本文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提出一些初步的、粗浅的看法以供探讨。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 理性精神

理性这个词,在这里是相对于蒙昧而言的。世界各民族的发展,都有一个从原始的蒙昧状态到理性精神的觉醒过程。而且在这种觉醒之后,理性精神与蒙昧思想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还是长期的,只不过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条件下这种对立和斗争有着不同的具体历史内容罢了。

中华民族自脱出原始的蒙昧状态之后，在长时期中理性精神占据主导地位，是一个有着高度理性精神的民族。这种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国古代在进入奴隶社会之后，一方面由于理性精神的觉醒和高涨，另一方面由于氏族血缘关系仍然大量地保存了下来，对祖先的崇拜超过了对上帝、人格神的崇拜，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无神论的思想是居于优势的，宗教从来没有成为能够左右和决定国家政治的统治力量。东汉后期虽然佛教输入了中国，并且日益地繁盛起来，但中国从先秦到两汉已经牢固地形成了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民族文化，所以佛教的输入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而是不断被中国文化所改造和吸收。统治阶级首先是信儒，其次才是信佛。在佛与儒发生冲突的地方，最后总是儒战胜了佛。而儒家对于鬼神的存在，或者采取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或者干脆加以否定和抨击，总之是不提倡、不赞扬。先秦儒家所讲的“天命”，即使在后来被认为把儒学神学化了的董仲舒思想中，也始终没有被化为一个宗教崇拜中的人格神。这种“天命”观念，在儒家思想中主要是一种和国家兴亡相联系，但又不能为人为力所左右的力量，并不是什么至高无上的救世主。而且儒家思想只把它看作是人对之无可奈何的力量，并不完全提倡人要屈服于它，向它低头膜拜。相信“天命”的孔子也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孟子更加表现出不受“天命”束缚的倾向，荀子则公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先秦道家所说的产生万物“道”也决非有意识的人格神，它的一切作用都是无意识的，而且连鬼神也要受制于它。“道”实际是中国古代对无所不在、微妙难言的自然规律的感受认识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原始素朴的抽象观念，并且和氏族社会生活中那种一切纯任自然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具有某种类似于西方泛神论的色彩，主要方面是倾向于唯物论的，非常明确地肯定了自然的运动变化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这种唯物论的思想，在韩非和《淮南子》的哲学思想中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先秦而后，中国历代无神论的思想延绵不绝，并且常常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对上帝的宗教崇拜的否定，是中华民族理性精神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相联系，中华民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把自然看作神秘的崇拜对象，更不去追求达到超自然的彼岸世界，而十分明确和充分地肯定着人与自然的统一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虽然道教之类的鬼神迷信在人民中有着长期广泛的影响，但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来看，并不占主导地位。这一类迷信，主要是人民在统治阶级压迫下产生的一种愚昧观念的自发表现，远远没有形成支配人民生活的教派。

第二、充分肯定个体与社会的统一性。这就是说，一方面充分肯定个体的感性生命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又强烈地主张个体感性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同他人、同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统一起来，两者应当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中，而不应当互相分裂和对抗。这是从远古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观念，它最为鲜明地表现在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中。尽管这里所说的“人”不包含奴隶在内，而且儒家思想主张爱有等差，但它终究充分地肯定了个体与社会的统一性，这是儒家思想中很可宝贵的东西。孔子曾谈到他的志向是要做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人，最为具体地说出了儒家所追求的个体与社会相统一的人生理想。从这种理想出发，儒家十分强调个人要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积极提倡和赞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道家对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和它对人的个性的束缚曾作了尖锐的批判，比儒家更为强调个体生命的存在和自由发展，但它并不否定仁爱的精神。老子主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庄子学派不但赞扬“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呿以湿，相濡以

沫”，于患难中互相救助的精神，而且热烈地希望人们脱离一切患难，象江湖中的鱼那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活。墨家的“兼爱”，有教人实行苦行主义、禁欲主义的一面，但也有积极地提倡个人为天下国家而献身的一面。法家明显地把个人私利的满足提到了重要地位，但它也仍然把这种满足同个人为他人和国家（当然是统治阶级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所作的事功相联，强烈地反对无功受禄。但墨法两家对个体与社会的统一的认识低于儒道两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也远不能同儒道两家相比。

第三、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的要求相统一。这一点是从上述个体与社会相统一的思想必然得出的结论。它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儒家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反情以和其志”、“发乎情，止乎礼义”等思想中。道家也认为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不应当“伤生”、“害身”。既反对否定感情、欲望的满足的禁欲主义，又反对无理性、无节制的纵欲主义，这也是中国民族的理性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起来看，否定对超自然的上帝、救世主的宗教崇拜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强烈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两者的分裂对抗，这就是中国民族的理性精神的根本。从现代的观点看来，这种精神的发扬，对于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欲横流的极端个人主义以及社会与个人的尖锐的分裂对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这就是西方不少学者对中国的儒家、道家以至禅宗的哲学日益发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们呼吁回到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原因。但实际上中国哲学就其本质和主流来看并不是神秘主义的，而且西方某些学者企图求助于他们所谓的“东方神秘主义”来解决西方面临的精神危机，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这种危机的产生有其客观现实的社会根源，不是仅仅在精神的范围内所能解决的。但是，这终究表明中国古老的哲学并没有成为完全死去了的历史的陈迹，它在现代也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在我国消灭了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努力在新的社会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发扬我们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合理的、宝贵的东西。这对于抵制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会产生十分有益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中所存在的重大弱点。这首先表现在它所说的理性是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礼法、伦理、纲常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着严重束缚以至扼杀人民个性发展的一面。这是必须坚决加以抛弃的。其次，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精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轻视物质生产和物质利益，轻视人对自然的科学的认识和能动的改造。这是同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杰出的自然科学成就，也不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没有意义，而是说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有着忽视对自然的科学研究这个方面，还没有达到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水平。对于自然界，它常常只求知其然，而不想进一步知其所以然，重实用而轻理论。如主张“勘天”、“制天命而用之”的荀子，同时又主张“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这固然有反对把“天”神秘化，等待“天”的赐与的意思，但又显然表现了对从理论上深入探究自然规律的轻视。

二 自由精神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②。这里所说的“刻苦耐劳”，和我们以上所说的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以及我们下面即将讲到的求实精神有直接的关系；而“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则首先是指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精神，但又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同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传统毫

无关系。例如，在反抗外来民族的压迫的斗争中，广大劳动人民固然是最坚决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属于统治阶级的某些阶层、集团和人物，同样积极地参与了这种斗争，并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得到了人民的赞颂。这说明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同样有着“酷爱自由”这个积极的方面，而且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发展产生了不能否认的深远影响。儒家所提倡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一方面固然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一种高度重视人格精神的自由，不向一切非正义的、邪恶的势力屈服的思想。“以身殉道”，从容就义，视死如归，历来是中华民族所讴歌赞美的伟大品格。从道家来看，它一方面主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有消极顺应自然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认为通过顺应自然就可以达到与天地合一的绝对自由的境界，有一种与宇宙同其永恒和无限的宏伟气魄。尽管道家对自由的追求无疑具有虚幻的性质，但它的这种宏伟的气魄却又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道家（特别是庄子学派）主张超越人世的利害、得失、祸福、荣辱、寿夭而达到与自然合一的绝对自由的思想里，既有逃避现实以至自我欺骗的一面，也有豁达、大度、乐观的一面。而且它的“法天贵真”、“达于情而遂于命”的渴望自由的思想，对儒家束缚个性的礼法是一个有力的冲击。道家思想的这个方面，使得中华民族有一种不因一时的挫折、失败、痛苦而否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精神，并且有一种鄙弃世俗的狭隘功利和统治者的显赫权势的反抗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的禅宗哲学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禅宗哲学由于转向了主体的内心世界，企图依靠“心”的所谓“顿悟”去求得解脱和自由，失去了道家那种力求与无限的大自然合一的宏伟气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突出了主体作为“我”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唯心的形式下表现了一种反权威的自由思想。而且禅宗的转向内心世界，并不是转向印度佛教或西方基督教所宣扬的彼岸世界，而仍然不脱离现世的日常生活。所谓“挑水砍柴，无非妙道”之类的说法，表明禅宗并不主张脱离现实人生到彼岸世界去寻求解脱和自由。

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中，鲜明地具有一种“酷爱自由”的精神，但这种精神几千年来处在奴隶主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重压之下，并且受着小农经济、家长制的严重束缚，因而使得中国人民的个性不可能象在西方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或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下那样获得充分的发展。这是我们现在必须加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西方民主政治下个性的发展又伴随着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分裂和对抗的发展，使人成了偶然性的奴隶，使人受到物的统治。而中华民族所要求的自由精神，却是以对人和自然、个体和社会的统一的充分肯定为前提的。这又是中华民族的自由精神的一个重大优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中，这种精神将在现代物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在建设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获得全新的发展。

三 求实精神

求实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从儒家思想来看，孔子虽有浓重的信古、好古、复古的倾向，但他所主张的“学而时习之”、“每事问”、“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闻阙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思想，都明显地表现了儒家的求实精神。孔子的“中庸”学说，主张全面地考察、权衡、处理事物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防止产生“过”或“不及”的毛病，同样表现了儒家的求实精神。孟子在很大程度上唯心地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他所主张的知人论世之类的说法仍然表现了求实的精神。而且他对人的主观

能动性的强调尽管是唯心的，但又有力地冲击了孔子思想的保守性。荀子提出了鲜明的唯物论思想，否认“生而知之”，强调后天的学习，“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大大发展了儒家的求实精神。荀子的学生，后来成为法家代表人物的韩非，比儒家更为强烈和激进地发展了求实精神。他的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的思想，有力地打击了儒家末流中存在的空谈、空想，能说而不能行的恶习。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说法，一方面是为了反对早期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等级特权，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法家高度重视实际经验和才干的求实精神。在对求实精神的发展上，法家有超过儒家的地方。但法家的求实精神带有极为狭隘的功利主义的特征，这又是它不及儒家的地方。

从道家思想来看，大讲玄虚之“道”的道家，同样也具有求实精神。老子就十分强调对事物的运动变化要有细致入微的洞察了解，不要忽视细小的东西。所谓“见小曰明”、“为大于其细”、“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祸莫大于轻敌”等说法，都表现了道家的求实精神。道家中的庄子学派主张“析万物之理”，十分重视规律与自由的关系，认为高度的自由是由于人的行动处处符合于客观规律而来的。这在《庄子》一书“庖丁解牛”等许多寓言中表现得很明显，说明庄子学派也并非完全没有求实的精神。此外，在《庄子》一书中还有着鲜明的反对教条与独断的思想。包含在墨家思想中的求实精神，在后期开始朝着经验的自然科学方向发展，但可惜在中国古代历史条件下未能继续下去。到了汉代，墨家即趋于衰微了。

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求实精神在先秦时期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楚。后来历代各家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唯物论者（如王充、王夫之、颜元等）的哲学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了它。

四 应变精神

由于中国古代经历过长期频繁的部落战争，又由于幅员广大的中国的统一和发展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复杂的政治斗争，因而使得中华民族有着高度的应变精神，能够镇定地和巧妙地驾驭处理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出现的各种复杂局面，克服和战胜各种危机，在长时期中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使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而不灭，至今巍然屹立于世界各大民族之林。所以，应变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反映在哲学上，这种精神是直接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虽然也同中华民族在长时期中对自然界的观察认识有密切关系，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对和国家兴亡相关的军事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的总结。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既是自然辩证法，同时更重要的又是军事政治的辩证法，经常同军事政治斗争中的战略策略问题的解决直接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老子的辩证法中有着最为突出的表现，因此老子哲学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应变精神最早的主要体现者。所谓“柔弱胜刚强”、“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之类的说法，一方面固然经常成为统治阶级用以争取和巩固其统治的阴谋权术，并且在法家韩非的思想中得到了详细的研究，充分暴露了统治者的阴险卑劣；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微妙而复杂的矛盾斗争，因而同样可以成为进步的、革命的阶级、阶层、集团、个人用以克敌制胜的武器。和道家、法家相比，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思想，看来不很重视如何掌握利用矛盾的应变精神，有它的迂腐的一面，但儒家也并非完全不注意应变精神。孔子的“中庸”的思想即包含有如何恰当地处理矛盾的思想。孔子所高度重视的《周易》，特别是其中为孔子之后的人所写的《传》，吸收了道家的辩证法思想，十分注意研究在社会政治斗争中如何应变而立于不败之地的问題，并且富于道家所缺乏的积极进取精神。

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穷神知化”、“极深研几”、“功业见乎变”、“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通其变使民不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知几，其神乎！……君子见几而作”等等说法，所讲的都是如何善于应变以取得成功。就儒家的经典来说，我们可以说《周易》是儒家应变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辩证法思想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高度应变精神的民族，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但这种应变精神，当它脱离进步的社会目标的实现，而成为统治者之间争夺个人权势和愚弄人民的手段的时候，就会成为卑劣的阴谋权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常常可以见到的，当然也是我们必须坚决加以抛弃的。

以上我们粗略地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的四个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理性精神。脱离了理性精神，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精神，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求实精神和具有积极意义的应变精神。但脱离了自由精神、求实精神、应变精神，理性精神也会成为空洞僵死的东西。而在理性精神之中，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可宝贵的东西是充分地肯定了两个统一，即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我深信，在去除了中国民族精神中封建性的糟粕之后，它所包含的各种积极、合理、深刻的思想，将会在当代的中国获得发扬光大。“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有着巨大的不可磨灭的意义，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的、宝贵的东西缺乏应有的认识或认识不足。这种情况在后来又因为“左”的、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而有所发展。今天，我们在思想文化上无疑应当继承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但同时又应当纠正过去所存在的偏颇，全面正确地估价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实际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本文所说中国民族精神中种种合理的、宝贵的东西并未死去，它仍然活在当代中国民族精神之中，体现在许多杰出人物身上，并且由于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改造而获得了新的发展。今天，为了振兴我们的民族，不是已经到了在继续深入批判中国民族文化中封建的、消极的东西的同时，注意发扬那些合理的、宝贵的东西的时候了？我们应当重温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这段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③。

（一九八四年十月）

注释：

① 所谓“全盘西化”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光辉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来说，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中华民族具有容纳、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伟大气魄和力量，决不会被外来文化所同化。这是中国全部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的。

②③ 《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第586、499页。